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父子接力，把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福建长汀中复村，一片革命的热土。观寿公祠前的石碑上，清晰镌刻着“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牵引着人们的思绪回到9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历史。

“革命的故事，要讲给当代人听。”秉持这样的理念，63岁的中复村村民、讲解员钟鸣从事专职讲解已10年有余。跟着钟鸣，记者一行在长征出发地聆听历史的足音。

1934年9月下旬，红九军团官兵奉命在松毛岭阻击敌人，任务完成后下撤至中复村集结，由此踏上漫漫长征路。中复村也因此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

“红军长征前多年的苏区建设，赋予这片土地厚重的红色底蕴，也留下了无数浸着血与火的故事。”钟鸣感慨道。

红军桥上，一道道刻痕引人注目。钟鸣伸手比画：“松毛岭战役期间，身高要高于1.5米才能报名参军。刻度线标注的就是1.5米，长枪加刺刀的长度。人们称它为‘生命的等高线’。”

“当时很多人踊跃报名。有人身高不够，就拼命踮脚，或者悄悄在鞋垫里垫上稻草。”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当红军的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在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前，回溯苏区军民患难与共的岁月；在村民老屋旁，讲述当年“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的场景；在红军桥红军街，细说“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等红军标语的来历……中复村的一屋一瓦、草木风物，钟鸣都了然于胸，声情并茂娓娓道来。



这是在福建长汀中复村拍摄的观寿公祠。（资料图片）

于钟鸣而言，这段历史从小就烙印心底。

“我的亲人里，有六位是红军烈士。革命年代，有的亲人从中复村出发后，牺牲在长征路上。”钟鸣常念叨一句话：红军烈士的后代不讲红军故事，谁来讲？

早在20世纪80年代，钟鸣便主动走访长征亲历者、搜集党史资料、购置相关图书，潜心研究红色历史。

2012年后，当地着手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建设规划，钟鸣作为民间志愿者参与其中。2015年，他结束了外地工作，回村扎了根，当起了专职讲解员。

长征路上牺牲的亲人埋骨何处？这一疑问始终萦绕在钟鸣心头。多年来，他多次踏上寻亲路，走访多地烈士纪念设施。

直到2017年，钟鸣终于在广西桂林的英名廊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望着茫茫湘江水，当年的他们怎会不知再往前就是牺牲？”钟鸣更真切体会到“血战湘江”的悲壮，领悟到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情。

“作为晚辈，有义务守护好、传承好这段历史。”钟鸣更加坚定了讲好红军故事的决心。

父辈的坚守，感染了年轻一代。钟鸣的儿子钟振华从厦门返乡，成为村里唯一从事讲解工作的本科生。

“我是在红军街上长大的。以前是‘听故事’的人，没想过会成为‘讲故事’的人。”起初，钟振华心里打鼓，“担心自己嗓子条件不好，讲不出效果”。

但在钟鸣看来，儿子学习能力强，懂得不少互联网知识，“不到3个月就能独当一面”。钟振华也慢慢探索出个人的讲解风格，从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

上阵父子兵。钟振华帮父亲把大量文献资料电子化，让红色记忆得到更好保存；针对不同群体，两人灵活调整讲稿，为党员干部传授微党课，为研学青少年多讲党史故事；紧跟时代发展变化，把社会流行词融进讲稿。钟振华还在琢磨：能不能借助人工智能和短视频，把文字讲解变得更鲜活？

如今，中复村已有10余名像钟鸣这样的专职讲解员。中复村成为了国防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的党员、官兵、学生和游客前来参观，回望峥嵘岁月。高峰期，钟家父子一天能接待20多个团队，从早忙到晚。

“我们会一直讲下去，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更多人。”钟鸣语气坚定。

阳光下，观寿公祠两侧，“万里长征第一步”“不忘初心再出发”的标语熠熠生辉。

（据新华社）

从平原烽火到振兴崛起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今昔巨变

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韩集镇孙庄村，鲁西南烈士陵园内9.28米高的纪念碑巍然矗立。

刚刚送走一批研学游客的讲解员王鑫介绍，鲁西南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这座陵园安葬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为国捐躯的万余英烈，无声诉说着永不褪色的忠诚。

曾经，广袤的冀鲁豫平原是烽火连天的抗日堡垒。当前，这片英雄的土地，正将昔日的坚韧与智慧，倾注于发展振兴的新征程，焕发出蓬勃生机。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丁河镇木寨村，村组两侧山坡曾是当年激烈争夺的阵地。如今，千亩标准化猕猴桃基地环绕山野，累累果实静待丰收。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附近山上的战壕里玩耍，昔日山坡阵地变成了今日的生态果园。”种植大户张新潮抚过沉甸甸的枝蔓说，如今村里引入中药材有机肥、智能化农机等，绿心果、黄心果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

传承红色资源，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奋进。

在河北省南宫市，冀南红色研学基地内青砖绿瓦的老式院落见证着抗日烽火岁月。舞台上，5名“冀南红小宣”队员身着八路军军服，演绎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场景，引得现场观众动情落泪。南宫市倡导中小学生担当红色教育主角，通过校园演讲选拔优秀“冀南红小宣”。2024年，这一模式吸引逾20万人次前来开展思政实践与研学活动。

红色热土上，特色产业也在传承中发展。

冀南红色研学基地内的一台样貌陈旧的手摇纺纱车默默讲述着“棉衣送八路军”的支前故事。如今，现代科技已深刻改变这片土地的面貌——采棉机替代弯腰劳作，滴灌技术实现精准用水。

在安美桥（南宫）羊绒制品有限公司，织机正源源不断“吐”出金黄色的成品面料。“我们的精纺羊绒面料年产250万平方米，全部出口欧美，价值是普通面料的5倍以上。”公司负责人高瑞星说。

依托当地常年10万余亩棉花种植基础，南宫市纺织产业已成功延伸至羊绒、羊剪绒、服装加工等领域。2024年，当地服装服饰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140亿元，带动近4万群众增收致富。

80年沧桑巨变，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烽火连天的战场变为生机勃勃的振兴热土。革命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如今正以研学基地、生态果园、智慧工厂等，为赓续红色血脉、赋能协同崛起写下生动的时代注脚。

（据新华社）

烽烟一纸聚华中

——抗战时期诞生的《新华报》

1942年7月，苏北阜宁县的农家土屋里，一份带着油墨香的铅印报纸正式问世——这便是由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共同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报》。在日伪军频繁“扫荡”、物资极度匮乏的盐阜抗日根据地，这张仅出版35期的报纸，成为凝聚华中军民抗日斗志的重要阵地。

应运而生，烽火创刊

1941年7月，日军纠集重兵对苏北盐阜区发起大规模“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被迫撤离盐城，辗转至阜宁农村坚持斗争。翌年3月，刘少奇奉中央之命启程返回延安。此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便肩负起主持华中抗日斗争的重任。彼时，华中各根据地星罗棋布，在艰苦的抗日环境中不断巩固扩大。陈毅深知，要争取抗战胜利，“不能光靠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当时，整个华中抗日区域亟须一份统一的机关报，打通各根据地舆论宣传脉络，指导全地区党政军工作。原本的《无线电讯》报只能转登延安新华社统一播发的消息，无法反映华中各地的抗日动态，基层军民也难以快速获取本地斗争信息。于是，在陈毅的提议下，华中局经过专题研究，决定将《无线电讯》报改版升级，正式定名为《新华报》，作为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机关报，面向整个新四军活动区域发行。

报纸筹办之初便面临重重困难，陈毅明确表态：“宁可减少一个旅的经费，也要把这张报给办起来。”经过3个月的筹办，1942年7月，《新华报》在苏北阜宁正式创刊。创刊号上，陈毅撰写的《伟大的二十一年——建党感言》一文正式刊发，为报纸定下了鲜明的斗争基调。《新华报》的版面设置贴合敌后斗争实际：一、二版登载新华社的国际国内新闻和华中各根据地的动态消息，三版刊发本地区的通讯报道，四版开辟文艺副刊。



1942年7月1日出版的《新华报》创刊号。

群英办报，多方支援

《新华报》的办报阵容十分精干：办报之初，陈毅亲自担任社长，陈修良出任总编辑，黄源担任副总编辑，全社人员虽少，却汇集了当时华中根据地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堪称“群英办报”。报社驻地紧邻新四军军部驻地停翅港和华中局驻地汪朱集，周边便是后来汇聚了阿英、范长江、孙冶方等数十位知名文化人士的卖饭曹文化村，彼此互通声气。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报纸的内容质量提供了坚实支撑。

当时，报社的物质条件极端匮乏，为了把报纸办好，工作人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和购置办报器材。根据地自产的纸张用完了，大家便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秘密购入；无法自给的印刷铅字、油墨、火油等关键物资，则经地下交通线从上海等地采购输送。在这样物资紧缺、补给艰难的困境中，《新华报》始终以亲民的定价面向根据地军民出版发行。

在通联工作方面，华中各级党组织、新四军军部自上而下普遍设立通讯员，战略区党委、新四军各师政治部还设置专职通讯员负责收集稿件。根据陈毅的要求，各师首长、战略区党委负责人带头为报纸供稿，稿件由当地交通总站统一送至报社，由此织就了一张覆盖广泛的通讯报道网络，将大江南北的抗日声音汇聚到一处。在发行工作方面，《新华报》依托华中各根据地建立了完备的发行体系，不在各地区单设发行机构，由当地书店和其他报社兼负发行职责，相继设立分销处，统筹本区报纸的分发调度。就这样，一则则真实生动的消息，一篇篇带着硝烟气息的文章，从田间地头和前线战壕出发，传递到芦荡水畔，最终送到华中地区军民手中。

掷地有声，传阅千里

从创刊起，《新华报》在烽火中坚持出刊，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激荡起巨大的精神回响。

报纸转载和刊发重要社论、专论，如《精兵简政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加强对敌政治攻势》《论主观主义与创造新学风》等，从理论高度宣传党的政策，指导华中各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建工作；同步发布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重大决策与工作部署，并跟进发表社论加以阐释，保障华中各地机关信息互通、步调统一。1942年下半年，为贯彻精兵简政指示，陈毅亲撰《精兵简政文选·序言》刊于报上；各根据地开展整风学习，报纸连续刊发专论统一思想认识。《新华报》还注重报道各根据地抗日动态和军民生活，对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作了大量报道，以内容鲜活、篇幅精炼的通讯，展现各地政权建设、生产减租、文化发展等新面貌，记录敌后根据地的新人新事新生活。

报纸一送到军民手中，根据地便会掀起学习讨论的热潮。虽然《新华报》的核心读者是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干部，但上到各区党委，下到基层百姓乃至外国友人都竞相订阅、互相传阅。除个人传阅外，部队和群众团体还会组织集体阅读、集体讨论，文化水平不高、不识字的同志也通过听人“讲报”的形式获取报纸内容。《新华报》的影响力很快扩大到华中地区之外，声传千里：地下交通人员将报纸秘密带入上海、南京、武汉等敌占区大城市；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还将报上的相关文章翻译成外文，通过上海的外国记者站转发至欧美和日本，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救国的政治影响。这张诞生在阜宁土地上的报纸，就像抗日烽火里的一支号角，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凝聚在一起。

1942年冬，日伪军调集兵力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局势急转直下。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为避开日军锋芒，作出撤离苏北、移师淮南盱眙县黄花塘的战略抉择，《新华报》随之停刊。此后新华社华中分社逐步发展，于1945年升格为华中总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也在同年12月创刊，一直将使命履行到解放战争后期。机构名称几经更替，这支新闻队伍凝聚华中军民、服务革命斗争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把党的声音从阜宁一隅传遍整个华中大地，激励着军民同心御敌，直至迎来最终胜利。

（据《中国国防报》）

张恨水喜画菊花

张恨水先生是我国现代旧体章回小说大师，他写作之余，常以练书法和画国画为乐。其中，张恨水最喜爱画菊花。

1947年夏季的一天，张恨水去拜访好友左笑鸿。见其手中摇着一把新买的白纸折扇，于是拿过来看了看，问：“怎么不着一字啊？”左笑鸿笑着说：“一把粗扇子，不值得写画，也没有把粘好了的扇子求人写画的。”张恨水笑着说：“我来。”于是提笔在上面画了一幅墨菊，上下还落了款。这时，曾给梅兰芳编过很多戏的齐如山先生一步迈进，一把拿过扇子相看，左笑鸿说：“还有一面，白的，偏劳啦！”齐如山推辞道：“你什么时候见我给人写过字？我是外行。”左笑鸿又说：“就要你这个外行吧。”张恨水也说：“一边是字的外行，一边是画的外行，正好配上。”没办法，齐如山只得提笔写了字，落款时，他却没带图章。左笑鸿说：“没关系，又不是去银行取钱。”以后很多人见到此扇，都说是一柄“双绝”的扇子。

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过生日，左笑鸿特意买了个黄铜铸的墨盒，想请张恨水添些墨宝再送给张友鸾。张恨水很高兴地在上面画了一幅菊花，还特意写下“应笑鸿嘱为友鸾作”。左笑鸿看后十分高兴，又挥笔写了“笑鸿持赠友鸾兄”几个字，由此可见三人友情之深厚。

张恨水喜爱养花，在书桌上，常有鲜花盛开。但以菊花最多，张恨水爱菊花，也就不能不画。他曾写过一首咏菊的词《浣溪沙》：“添得茅斋一味凉，瓶花带露供书窗，翻书摇落满瓶香。飘逸尚留高士态，幽娴不作媚人装，黄华同类哪寻常？”

（据《联谊报》）

北宋皇陵的“前世今生”



（资料图片）

近日，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向我国返还两件流失文物，使社会公众关注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的保护及相关工作。

北宋皇陵坐落于今河南省巩义市，始建于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止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北宋九帝中，徽宗、钦宗被金人掳掠、囚死漠北，其余七帝皆葬于此；再加上追封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永安陵，合称“七帝八陵”。八陵依次为：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除永安陵为帝后合葬外，其余皇帝和皇后皆实行“同茔合葬”制，皇后单独建造陵园，祔葬于帝陵的西北隅。各陵之内还陪葬有规模庞大的宗室墓群，并专设永安县以奉陵寝，建皇家禅院以追福祖先。

北宋皇陵的选址深受当时风水堪舆观念影响，导致了北宋皇陵陵园南高北低的格局，一反古代建筑逐渐增高的传统，成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上的孤例。

八座帝陵诸陵园区（兆域）建制统一，平面布局基本相同，皆坐北朝南，均由上宫（皇帝陵）、皇后陵、下宫（日常侍奉、祭祀及守陵等组群式建筑）和陪葬墓构成。南部的上宫为陵园区最主要部分，是大型朝拜祭奠之所，以陵台为核心；陵台平面正方，系夯土筑成，呈三层台阶状，表面涂朱，前设献殿，周环神墙；神墙四隅建角阙，四面正中辟门，门侧设阙台，门外各列石狮一对。南神门外神道两侧，石像生群对称排列，象征仪仗；再南为乳台，陵园区南端入口处立鹊台一对。鹊台、乳台、门阙、角阙皆夯土筑成，外包砌青砖。皇后陵均祔葬于帝陵上宫西北，建制全仿帝陵上宫，唯规模缩小。下宫位于陵园区的最北部或帝陵与皇后陵之间。

各帝陵上宫石刻共60件。除东、西、北神门各1对门狮，南神门内及陵台前各1对宫人外，余者皆集中于乳台以北、南神门以南的神道两侧。石像生东西相向、两两对称，由南向北依次为：望柱、象、驯象人、瑞禽石屏、甬端、马和控马官、虎、羊、客使、武官、文官、南门狮、上马石、守门武士。皇后陵石像生数量减少，每陵30件。

北宋皇陵神道石像生（见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是研究宋代礼制体系、雕刻艺术的实物载体，具有极高的价值。神道石刻风格可大体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和真宗永定陵，以及祔葬四座帝陵的皇后陵，整体较为粗壮。中期包括仁宗永昭陵和英宗永厚陵，石雕像形体由早期的健壮雄伟趋向挺拔秀美。晚期包括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以及祔葬永昭、永厚、永裕、永泰四陵的皇后陵，此时的石雕像形体普遍修长，与早期形体的健壮浑圆形成鲜明对比。整体上看，宋陵石雕在继承汉唐陵墓石雕技法之上又有创新，形成注重写实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书写了独特的一页。北宋时期的石雕艺术在近年发现的开封北宋东京城州桥河岸两侧巨幅石雕壁画上有精彩呈现。

1982年，北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90年代出版有大型考古调查报告《北宋皇陵》。永昭陵上宫于1995—1997年经过整修复原。北宋皇陵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一直持续推进。

进入新时代，宋陵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得到了加强。各个陵园区保持全天候人防巡护、技防监控等。2022年，宋陵列入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设名单。除个别陵保留“麦田里的守望者”原生场景外，永昌陵、永厚陵等在进一步考古调查基础上，开展了全新的保护与环境治理工作，展示利用出现新的理念和方式，分别建成城市型、旷野型等不同类型的遗址公园。

宋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研究成果被评为2025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利用新的数字化技术，研究人员对宋陵石像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数字化图像信息采集，宋陵保护与利用的数据信息资源库正在构建中。

（据《人民日报》）